

# 容闳‘复兴中国’思想和活动略议

刘学照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062)

**摘要:**留美爱国者容闳是近代“新中国运动”的先驱,他德兼中西,与时偕行。他所倡导的派遣童赴美留学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特开新纪元”的创举,成为近代中国“科教兴国”和“复兴中国”的“前驱先路”。他毕生为“改良政治”上下求索,“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位迎着“诛妖救世”、洋务自强、维新变法、共和革命等社会思潮全程拾级而上、与历史潮流同步的“复兴中国”志士。

**关键词:**容闳;复兴中国;思想;活动

中图分类号:G122;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004(2006)04-0030-05

容闳是第一位“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中国人,他一生“志在维新中国”,“改革和复兴中国”。<sup>[1] 39-140</sup>通过对容闳“复兴中国”思想和活动的议析,可以显现他作为近代“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的历史地位。

## 一、“天京之行”：“复兴中国”的一次探路

容闳是一位始终不渝的爱国者。他于1854年从美国耶鲁大学即将毕业归国之际,即树立“复兴中国”之志。他“自以为”,自己是“被当作西方文明表征的西方教育”的受益者,“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sup>[1] 62</sup>容闳“复兴中国”思想和活动主要有实施其“教育计划”和“改良政治”两个方面。他为实现既定目标,在归国后的“初入社会”阶段,即努力寻求“复兴中国”之路。

1851年中国发生了以“诛妖救世”为号召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除少数像何震川这样低层次士人附和运动外,大部分封建士人、尤其是科举功名比较高的中上层士人,在起义农民面前基本上是‘铁板一块’”。<sup>[2]</sup>拿容闳与同时代的中国士人相比,他有很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又能以较开放的态度对待政治改革和政治变革,以致他能与众不同地把太平天国运动作为“复兴中国”的一种选项。如他所说,“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尤甚”。1855年夏

他居广州,适逢两广总督叶名琛“出极残暴之手段”镇压天地会红巾军起义。他目睹“种种惨状”,“乃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他为解决头脑中对太平军“果胜任创造新政府以代满洲乎”的悬念,至1860年秋冬间遂有天京之行。<sup>[1] 61-88</sup>

容闳1856年在香港时认识洪仁环。到天京后,他“探视故人”,向已成为干王的洪仁环提出“七事”,即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建设海军学校;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营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圣经为课程之一;设立各种职业学校等。<sup>[1] 94</sup>显然,这份改革建议,实际上是一幅包涵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改革内容的早期近代化蓝图。

容闳曾说,“南京之行,本希望遂予夙志,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二者有所藉手,可以为中国福也”。<sup>[1] 99</sup>但结果,他根据“观察所及”,断定“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从而使原先“对于太平军颇抱积极希望,庶几此新政府能除旧布新”的愿望落空。<sup>[1] 100</sup>虽然如此,这次超越时人的访问仍应被视为是容闳对寻求“造新中国”之路的一次大胆的探索。

## 二、“教育计划”：平生“报国”的“最大事业”

收稿日期:2005-12-25

作者简介:刘学照(1935-),男,江苏建湖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学研究。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随着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一场“循用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的洋务运动接踵发生。容闳通过“天京之行”顿悟“太平军”不足恃”后,遂把实现“夙志”的目光转向洋务派和洋务运动。1863年秋,容闳因入曾国藩幕府的李善兰等人荐言“其人抱负不凡,常欲效力政府,使中国得致富强”而“受知”于曾。<sup>[1] 106</sup>他在安庆向曾国藩提议建立“制造机器之机器”的“母厂”,“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sup>[1] 111</sup>旋奉命赴美采购机器,使中国第一个近代大型企业江南制造总局于1865年顺利建成。容闳的创议是启迪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很快形成“觅制器之器”(见清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5卷》)的“制器”思想的重要原由。1867年,容闳趁曾国藩“来沪视察”江南制造总局时,“复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厂上之理论与实验”,“不久遂得实行”。至清末已“造就无数机器工程师”。<sup>[1] 120</sup>1867年,容闳向总理衙门呈递《拟议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建议在上海筹组华商轮船公司。第二年,他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转呈《条陈四则》,重申组织一“纯粹之华股”“合资汽船公司”的倡议。<sup>[1] 121-122</sup>这些建言实开1872年轮船招商局创办的先声。此外,容闳在洋务运动中,还在译书、购买枪炮、办报、代为选聘“洋匠”等方面作出了诸多努力和贡献。

容闳是近代中国留学运动的开创者。他在洋务运动中作出的最大贡献是首倡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他始终将之“视为最大事业,亦报国之唯一政策”。<sup>[1] 135</sup>他在曾国藩准请“于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后,自度“向所怀之教育计划,可谓小试其锋”。遂进而向已升任江苏巡抚的老友丁日昌多次“语以所谓教育计划,丁大赞许。”又“恳其常向曾督言此”。<sup>[1] 121-125</sup>及至1870年间,经丁日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往返相商,容闳所提出的派遣120名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终于获得奏准和实施。<sup>[3] 153-174</sup>

派遣幼童赴美留学是近代中国留学运动的开端。容闳所倡导的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作为中国人有组织的走出国门吸取西方科学和文化的“破冰之旅”,确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特开新纪元”的创举。虽然,由于清政府内部保守势力的攻击和作梗,留美计划于1881年被猝然中止,大部分学生“未能受有完全教育”而“凄然返国”,因此严重折

损了这项计划的成效。但从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容闳“教育计划”对近代中国历史变迁所发生的作用是不应低估的。

历史表明,1872年至1875年分四批共派120名幼童留美,“除因事故撤回及在洋病故26名外,其余94名”,均于1882年分三批回国,“头批学生21名均送电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内有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其余50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均能始终勤奋,日进有功”。<sup>[3] 167</sup>他们不仅很快从归国之初所曾受到的某种猜忌和冷漠中振作起来,而且在以后长期的历练中,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步成为各方面的杰出英才,对洋务运动和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作出了特出贡献。如以詹天佑为代表,在铁路、矿冶、航运等科学技术和实业方面做出了众多成绩;以唐绍仪以及梁诚为代表,在内政、外交工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以唐国安、蔡绍基为代表,在创立高等学校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此外,还有一项重要业绩,那就是留美幼童撤回后,先后有四十多人在海军中服务并担任要职,有沈寿昌、陈金揆等七人在中法、中日海战中为国捐躯,他们的英名永垂史册。<sup>[4]</sup>总的来说,在洋务运动和清末社会变革潮流中,昔日留美幼童们始终站在前沿的位置,这也显现和深化了容闳的“教育计划”的历史意义。

先驱者的历史功绩是会伴随着历史潮流的发展而增色的。容闳派遣学生留美计划虽被中止,但“走向世界”、“学习外国”的历史潮流是无法阻挡的。甲午中日战争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而留学运动的再起成为民族觉醒的一种表征。随着清季留学运动的蓬勃发展,留美学生也逐渐增多:1900年,10人;1905年,30多人;1910年,增至500多人。1910年《留美学生年报》欣称:“中国留学生满布于美国”。<sup>[5]</sup>时届耄耋之年的容闳也感慨地写道:“自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国学生陆续至美留学者,已达数百人。是1870年曾文正所植桃李,虽经蹂躏,不啻阅二十五年而枯株复生也。”他还满怀深情地说,当年“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sup>[1] 145.39-40</sup>应该认为,近代中国复兴之路是一个长期、艰难而曲折的历程,它最初是从吸取西方科学文化开始

的,而且“科教兴国”始终是中国复兴历史内涵的一个重要层面。容闳首倡留学运动成为近代中国“科教兴国”和“复兴中国”的“前驱先路”,其功厥伟。

### 三、“改良政治”与晚清历史潮流同步

容闳“志在维新中国”,他从“抵安庆”初登政治舞台“开始,对“改良政治”一直寄予企盼。迨留美“教育计划”夭折,他深切地感到“中国根本上之改革”已“不容稍缓”。<sup>[1]144</sup>不久,他作为驻美、西、秘副公使也任满,离美回国。1883年夏,他因妻病返美,三年后妻丧,为抚育两个年幼的儿子,在美卜居。尽管事业和生活双遭不幸,仍时刻不忘报效祖国。

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历史潮流影响下,容闳探索“改良政治”的路程也在发生转折。甲午战争爆发后,容闳愤“日人”借此兴戎,“爱国心油然而生”。他通过昔日驻美公使参赞蔡尔康向张之洞“条陈”“战事”规划”。旋奉张电召“立归中国”。1895年初夏抵上海,探寻“再作一番事业”的政治道路。<sup>[1]146-149</sup>他先后提议“聘用外人”,“重新组织”中国行政机关;“于北京设立一国家银行”<sup>[1]151-154</sup>准美商筹款“造成”中国“全境铁道”<sup>[6]</sup>;修筑“天津直达镇江”铁路<sup>[1]154</sup>等。在这些献策中,爱国之心清晰可鉴。但有些因列强之间的矛盾和清政府官员的派系斗争而未果;有些因他对脱离已久的中国的国情缺乏充分了解而难于实行。从此,他收起寄希望于“洋务”的“救助中国之心”<sup>[1]154</sup>,放弃从“受知”于曾国藩以来一直沿用的“求知当道,游说公卿”的求索政治模式,而跟随维新潮流前进。

容闳1896年在上海时结识梁启超。1898年,容闳有感于在“中国政治上存亡危急之秋,适维新潮流澎湃而来”,“光绪帝受此奇异势力之激动,遂奋起提倡维新之事业”,他“目睹此状,乃决意留居北京”。<sup>[1]155-156</sup>他“在北京时,常遇康有为、梁启超二人”。他参加康有为宣传变法的活动。据记载,保国会“开会第一日,南海演讲俄罗斯问题”,容闳“在场”。<sup>[7]112</sup>容闳所在金顶庙“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领袖之会议场。<sup>[1]156</sup>百日维新失败,容闳函请李提摩太营救梁启超。康有为逃离北京时,致密函于李提摩太,请求将所附致容闳信“代为密交,各情并告知,此函亦并示之”。<sup>[8]</sup>正因为容闳与康梁等维新

派关系比较密切,政变发生后,他“不得不迁徙以逃生。乃出北京,赴上海,托迹租界中”。<sup>[1]156</sup>

戊戌政变后,容闳在上海与唐才常、汪康年、经元善等人颇多交往,与海外的康有为等人仍互通声气。1899年底,容闳秘密去香港。1900年1月下旬,发生清廷立大阿哥的“己亥建储”事件。上海经元善联名一千多在沪绅商通电反对。后遭清廷缉捕,逃居澳门。容闳致函经元善,“感触”他“电争之事”,称誉他“保君大节”,并自称“仆与公异流同源”。另外,又致函港督,请求允许让经转移到香港。<sup>[9]</sup>1900年3月底,容闳到新加坡,与康有为以及新加坡侨商邱菽园等商议起兵勤王事宜。参与会见的丘逢甲在《星洲喜晤容纯甫副使,即送西行》诗中,有“艰危天下局,慷慨老成谋”、“南华楼上话,一夕定千秋”、“秉之原未老,终仗力回天”等句<sup>[10]</sup>将容闳比喻为趁武则天病重发动政变帮中宗复位的张柬之,称咏容闳在这次“勤王”密谋中居有领袖群伦的地位。

1900年6月,北方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为挽救时局,在唐才常等人策划下,维新派人士于7月下旬在上海愚园召集“中国议会”,亦名“中国国会”。会上,容闳与严复被选举为正、副会长。容闳“向大众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在会人意气奋发,鼓掌雷动”。<sup>[7]243</sup>容闳又负责起草英文宣言,严复译成汉文,此文即成为唐才常自立军起义时的《汉口自立会宣言》,其中说:“变旧中国为新中国,我辈之责任也,我辈宜亟谋皇帝复辟,而创立立宪帝国”。<sup>[11]</sup>可见,容闳与自立会的政治目标是通过光绪复辟实行君主立宪,从而使旧中国变为新中国。

传统的旧中国演变为现代的新中国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又是一个自觉的历史运动。作为历史进程从鸦片战争已经开始,但在社会主体层面得到较自觉的反映则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应该说,被梁启超自评“新中国史第一章”的戊戌维新和宣称以“建设新中国”为“无上之宗旨”的共和革命,同属于清末新中国运动的不同的层次。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新中国运动中的保皇立宪和共和革命这两股潮流开始急速分化,向以“维新中国”为职志的容闳,逐渐使自己与共和革命潮流连接起来。

事实上,容闳1899年底抵香港后,通过在香港

兴中会总部参与办理《中国日报》的堂弟(1882年回国的第三批留美幼童)容星桥,与兴中会员谢缙泰结识并建立了较密切的友谊。时兴中会与康、梁谋求合作。谢多次主张推选容闳为维新联合党派主席,以容闳为未来的临时政府总统。容闳从谢缙泰那里开始了解孙中山,并同意谢向他提出的与孙联合和合作的主张。<sup>[12]</sup>1900年8月22日,孙中山自日本横滨秘密赴上海,拟运动以容闳为会长的国会(原名自立会)及其他力量联合反清。孙中山临行前在一次谈话中称赞容闳在国内“颇孚人望”,可作为中国政治改革各派联合的“众望所归的领袖”。<sup>[13]</sup><sup>198</sup>孙中山抵上海,得知自立军起义已失败,旋即于9月1日返回日本。而容闳和容星桥也正因逃避缉捕于同船去日。经容星桥介绍,孙中山在船上与容闳相识。两人抵日本横滨后,孙中山一再与容闳“密议”、“面谈”。<sup>[14]</sup>孙中山后来计划在惠州起义得手后于华南“先立一暂时政府”,而拟选择容闳和何启“各当一面”地负责对“外国”的工作。<sup>[13]</sup><sup>202</sup>容闳于1902年6月返抵美国后,一面与革命派人物谢缙泰和孙中山等建立联系,一面与康、梁等继续交往。在一段时期内力图利用自己与双方的关系,把两股变革势力联合起来。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共和革命潮流日益澎湃。随着“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从1908年起,容闳日益对康有为不满,于是加强了对革命派的支持与联系。1909年底,容闳邀请孙中山到纽约,共同商讨他与美国军事学家咸马李和财界人士布思等人拟就的《中国红龙计划》,拟募集巨款和枪械援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1910年2月,容闳书面提出此项计划的步骤。3月,孙中山函告容闳关于自己至洛杉矶长堤与咸马李、布思举行会议的结果。<sup>[15]</sup>容闳的这一计划最后虽未能实现,但他与孙中山的联系仍持续不断。武昌起义后,容闳写信给谢缙泰,称赞这是一次“了不起的革命”,欢呼并祝愿“成立一个共和国”,强调“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请谢代向孙中山“致以衷心的庆贺”,表示自己如健康好转,或许回来“参观这个共和国”。<sup>[13]</sup><sup>326</sup>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致函容闳,称他为“太平洋对岸”老同志,“恳请”他回国参加“民国建设”。<sup>[16]</sup>孙中山还“赠送他一张照片”,信寄送到时,容闳“早已昏迷不醒”,当天就逝世了。次日,容闳所在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的《哈城日报》称评容闳为

“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sup>[1]</sup><sup>31</sup>

#### 四、尾论:德兼中西和与时俱进

综上所述,容闳“复兴中国”的思想和活动主要有实施“教育计划”和“改良政治”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他1860年对“太平军中之访察”就是“希望”使“二者有所藉手,可以为中国福”。这次探路失望后,便想通过“效力”“清政府”使中国得致富强”。他在洋务运动中倡导的派遣学生留美的“教育计划”,旨在“改良文化”,即“藉西方之学术,以改良东方文化”,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sup>[1]</sup><sup>124</sup>它是近代中国留学运动的开端,也是容闳“教育救国”思想的凸显。1881年这项计划夭折后,他开始认识到“中国根本上之改革”不容稍缓”,从而使他“复兴中国”思想中的“改良政治”层面有更多凸显。甲午战争爆发激发了他的爱国衷情。他结束了因事业和家庭双遭不幸而在美卜居的生活,毅然奉召回国。在经过一个短时期的“再作一番事业”的探索后,他最后收起“求知当道”的“救助中国之心”,跟随甲午战后兴起的“学习外国改革政治”的历史潮流前进。先是参加维新派活动,憧憬通过“创立立宪帝国”,“变旧中国为新中国”。1902年因逃避清廷缉捕返居美国,加强了与革命派联系。1908年后,他将自己的“复兴中国”思想和活动完全与共和革命连接起来。容闳是一位“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的爱国者,他从早年的求学、择业、“入世”到后来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长期奔走中,事事“视道德为重”,以“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为标准。他忧时感事,在早年即感触清廷腐败,关“念中国国民”,<sup>[1]</sup><sup>74,61</sup>具有中国传统士人的“赤子之心”。同时也具有从长期所受西方教育中养成的“自由所固有”的自由理念和“独立自主精神”。<sup>[1]</sup><sup>58,163</sup>他是一位具有历史使命感,以“西学东渐”,改良中国文化为己任的德兼中西的爱国者。他强烈的“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sup>[1]</sup><sup>173</sup>近代新中国运动是一个长期的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容闳自学成归国后的五十多年间,始终为“维新中国”、“改革和复兴中国”上下求索,与时偕行。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位迎着“诛妖救世”、洋务自强、维新变法、共和革命等社会思潮全程拾级而上、与历史潮流同步的“复兴中国”志士。因此,称容闳为“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既是时人的称评,也是历史的定位。

## 【注释】

“新中国运动”一语为1912年4月21日容闳所居地美国康州《哈城日报》所首用。笔者在近代史研究中,将“新中国运动”作为一个历史命题和历史概念进行解读。见拙文:《简论近代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容闳》(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孙中山是新中国运动的开创者》(载于台北《国父纪念馆馆刊》第11期)。

容闳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他在耶鲁大学毕业时向同学赠言中写有“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英文诗。参见章开沅:《先驱者的足迹》,吴文莱、高德民、梁振兴等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573页。

## 【参考文献】

- [1]容闳.西学东渐记:走向世界丛书本[M].长沙:岳麓书社,1985.
- [2]刘学照.洋务思潮与近代中国[M].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76.
- [3]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153-174.
- [4]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5]李喜所.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738.
- [6]戴学稷,徐如.爱国华侨学者容闳(下)[J].《暨南学报》,1982,(02).
- [7]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 [8]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下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1:1086.
- [9]虞和平.经元善集[Z].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376.
- [10]广东丘逢甲研究会.丘逢甲集[Z].长沙:岳麓书社,2001:463.
- [11]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480.
- [12]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Z].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308.
- [1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4]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Z].北京:中华书局,1991:239,242.
- [15]罗刚(遗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二册[Z].台北,1988:1237-1238,1249-1253.
- [16]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144.

(责任编辑:孟繁华)

## Discussion on Rong Hong's idea and activity of China Renaissance

LIU Xue-zhao

(History Department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Rong Hong who studi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a patriot as well as a forerunner of "New China Movement" at modern times. He had lofty moral and kept pace with the times. He advocated to send young students to study in foreign countries. This was a creation in Sino-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 and a trial approach of "Prospering State by Means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China Renaissance". He devoted all his life to political reform and believed that China would surely enjoyed a bright future. He was a soldier at modern times who fought against enemies, learned from foreign countries and kept pace with the world.

**Key words:** Rong Hong; China Renaissance; idea; activity